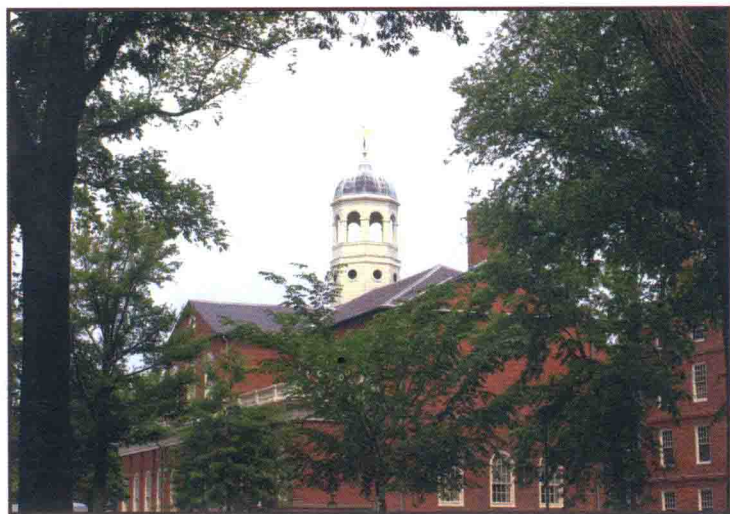


基础教育国际化丛书

The Death and Life of the Great American School System
How Testing and Choice are Undermining Education



[美] 戴安·拉维奇 (Diane Ravitch) 著

美国学校体制的生与死

论考试和择校对教育的侵蚀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e Death and Life of the Great American School System
How Testing and Choice are Undermining Education

美国学校体制的生与死

论考试和择校对教育的侵蚀

[美] 戴安·拉维奇 (Diane Ravitch) 著
冯颖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2-281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学校体制的生与死/(美)拉维奇(Ravitch, D.)著;冯颖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0

(基础教育国际化丛书)

ISBN 978-7-301-24784-6

I. ①美… II. ①拉…②冯… III. ①教育制度—研究—美国 IV. ①G5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9363号

THE DEATH AND LIFE OF THE GREAT AMERICAN SCHOOL SYSTEM by Diane Ravitch

Copyright © 2014 by Diane Ravitch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Intelligent Education Management Company &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through Bardonia 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书名:美国学校体制的生与死:论考试和择校对教育的侵蚀

著作责任者:[美]戴安·拉维奇 著 冯颖 译

责任编辑:泮颖雯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4784-6/G·3876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站: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yl@pup.pku.edu.cn

电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7印张 272千字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3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基础教育国际化丛书

编委会名单

主 编：陶西平

副主编：陈李翔 安 蔚 王 燕

编委会：李 夏 刘雅璇 杨千帆

专家委员会：Bill O'Hearn William Powell Ochan Kusuma-Powell

莫景琪 陈向明 Nick Bowley Rhona Bowley

Eva I. Kampits Marilyn S. George

序 言

多年来，学校教育体制的改革一直困扰着我们。“高考指挥棒”“教育产业化”“学校行政化”“学生减负”等常常成为社会各界的谈资。许多人一边在讨论“教育公平”，一边想方设法地将自己孩子送进重点名校。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说，孩子们太苦，家长们太累，中国正在失去创造力，因此教育必须改革。可是，有多少人想过，教育改革的目的是什么？

2002年1月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实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CLB)，宣布“全国所有的孩子在2014年之前，在阅读和数学方面均须达到‘熟练掌握’的标准”。这一法律“开启了美国公立教育系统中考试和责任制的新时代。”但是，曾经积极推动教育标准化运动的黛安·拉维奇后来却认为，这一法律是建立在一种错误认识基础上的惩罚性法律。

20世纪90年代初期，黛安·拉维奇曾担任美国教育部助理部长和顾问，直接主持和参与了一系列教育标准的制定。她曾经认为考试和择校机制能够结束教育界的官僚做法，使穷人家的孩子不被忽视，帮助那些经济贫困的父母，使穷人的孩子不会被淘汰，使得贫穷或富有的孩子、黑人或白人的孩子之间不再有学习成绩上的巨大鸿沟。她曾相信考试机制会给那些不太好的学校的学生带来一道曙光，择校机制则会给穷人的孩子创造上好学校的机会。

2007年开始，她有机会来反思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过程。她访问了许多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 and 慈善家，意识到美国公立中小学正在面临困境。她在书中分析了各种教育政策如何影响当今的教育实践，以及应该做什么来改善孩子们的状况。她说，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高分，而是教育学生成为思想成熟、品行端正、有责任感的公民。优质



教育的基础在课堂、家庭、社区和文化之中，但当代的改革者们却仍在寻求捷径和“简明答案”。组织结构改革本身并不能自动产生健全的教育课程，也不能自动将我们的教育水平提高到我们所追求的“卓越”的高度。真正能发挥长期功效的措施，是改进课程和教学方法，改善师生的学习和教学环境，而不是无休止地争论学校系统应该如何组织、管理和控制。

今天，中国基础教育体系也正在面临变革。尽管中美两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有很大差异，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黛安·拉维奇的反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事实，判断趋势。生还是死？这的确是一个问题。然世间万物，皆向死而生，是为新生。

北京乐成教育研究院陈李翔

2014年10月



致 谢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有如此多的读者愿意与我分享他们的观点和想法,我感到十分幸运。塞缪尔·阿布拉姆斯(Samuel Abrams)、琳达·达玲-哈蒙德(Linda Darling-Hammond)、迈克尔·弗尔(Michael J. Feuer)、里奥尼·海姆森(Leonie Haimson)、E. D. 小赫西(E. D. Hirsch Jr.)、瑞塔·克拉默(Rita Kramer)、亨利·莱文(Henry Levin)、杰佛瑞·迈瑞尔(Jeffrey Mirel)、亚伦·帕拉斯(Aaron Pallas)、琳达·佩尔斯顿(Linda Perlstein)、罗伯特·彭蒂斯罗(Robert Pondiscio)、迈克尔·拉维奇(Michael Ravitch)、萨拉·瑞克豪(Sarah Reckhow)、理查德·罗斯坦(Richard Rothstein)、罗伯特·谢波德(Robert Shepherd)、罗琳·斯肯(Lorraine Skeen)、赛欧·斯特恩(Sol Stern)和安德鲁·沃尔夫(Andrew Wolf)曾阅读过本书部分章节甚至是全书的手稿。乔丹·西格尔(Jordan Segall)和詹尼弗·詹宁斯(Jennifer Jennings)为我解释了人口统计方面的资料。当然,以上各位均无须对本书的任何结论或错误承担责任。安东尼·阿尔瓦拉多(Anthony Alvarado)、伊丽莎白·阿伦(Elizabeth Arons)、肯尼斯·伯恩斯坦(Kenneth J. Bernstein)、艾伦·伯辛(Alan Bersin)、詹尼佛·贝尔·埃尔万戈(Jennifer Bell Ellwanger)、安德鲁·贝弗里奇(Andrew Beveridge)、乔纳森·博曼(Jonathan Burman)、希拉·伯得(Sheila Byrd)、大卫·康托(David Cantor)、凯瑟琳·卡辛(Kathleen Cashin)、卡尔·科恩(Carl Cohn)、约翰·德贝克(John de Beck)、卡门·法瑞纳(Carmen Faria)、大卫·费列罗(David Ferrero)、艾里克·汉那谢克(Eric Hanushek)、杰夫里·汉尼格(Jeffrey Henig)、弗雷德里克·赫斯(Fredrick Hess)、山姆·休斯顿(Sam Houston)、丹·卡兹尔(Dan Katzir)、理查德·卡斯勒(Richard Kessler)、麦茨·李(Mitz Lee)、罗伯特·琳



(Robert Linn)、汤姆·拉吾莱斯(Tom Loveless)、凯伦·迈尔斯(Karen Hawley Miles)、霍华德·尼尔森(Howard Nelson)、迈克尔·帕德里(Michael Petrilli)、玛格丽特·雷蒙德(Margaret Raymond)、贝拉·罗森伯格(Bella Rosenberg)、安东尼·索瑞斯(Anthony Shorris)、雅克·斯坦伯格(Jacques Steinberg)、南希·范·米特(Nancy Van Meter)、罗宾·维特罗(Robin Whitlow)、乔·威廉姆斯(Joe Williams)、弗朗西斯·奥尼尔·齐默尔曼(Frances O'Neill Zimmerman)、卡米尔·赞布罗(Camille Zombro)为本书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芭芭拉·巴塞罗姆(Barbara Bartholomew)是我在圣地亚哥的引路人,她介绍我参加会议,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所获得的信息,为我安排了很多有针对性的与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和学区官员的访谈。我有幸在最后修订手稿的过程中请到戴安娜·辛尼切尔(Diana Senechal)作为研究助理和编辑。她确保本书用词恰当、脚注准确、网址有效、语法和用法恰如其分、语言流畅。我对她为本书所付出的时间和热情感激不尽。感谢威廉·西蒙基金会(William E. Simon Foundation)和阿什利斯-宝德曼基金会(Achelis-Bodman Foundation)资助了我的研究工作。我感谢那些在过去和现在激发过我的灵感的朋友们,包括珍妮·雪儿(Jeanne S. Chall)、劳伦斯·克雷明(Lawrence A. Cremin)、E. D. 小赫西、桑德拉·罗斯(Sandra Priest Rose)和阿尔伯特·杉克尔(Albert Shanker)。我尤其要感谢我的朋友、同事和搭档玛丽(Mary),她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始终给我鼓励。我感谢精力充沛的代理人、“作家代理公司”的琳·楚(Lynn Chu),她从一开始就对本书充满信心。非常感谢“基础图书公司”的梅雷迪斯·史密斯(Meredith Smith)和安托瓦内特·史密斯(Antoinette Smith)认真帮我审阅了手稿,以及“哥德堡·麦克杜菲公司”的琳·哥德堡(Lynn Goldberg)和安吉拉·海耶斯(Angela Hayes),他们给了我全心全意的支持。感谢本书的编辑、“基础图书公司”的蒂姆·沙利文(Tim Sullivan),他迅速地理解了本书的精髓,并为我的作品建议了一个出色的书名。我们一致同意用这个书名向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致敬,她的名著《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造就了全国性的城市复兴运动。因为我就生活在她所描述的那种环境之中,那是



一片被保存下来的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街区，我喜欢我的书与她的作品之间的联系和默契，我期待着无论是作为整体的美国教育还是具体的城市教育都可以走过同样的复兴之路。



目 录

第一章	我对美国教育改革的认识和思考	(1)
第二章	灾难! 课程标准运动如何演化成了考试运动	(15)
第三章	第二学区的转型	(32)
第四章	圣地亚哥学校教育改革的启示	(51)
第五章	纽约市的商业模式	(74)
第六章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 考评和惩罚	(101)
第七章	择校: 一个设想所引发的故事	(122)
第八章	责任制的困扰	(160)
第九章	拉特莉芙女士该怎么办?	(182)
第十章	亿万富豪小子俱乐部	(209)
第十一章	经验和教训	(238)
译后记	(258)



。我对美国教育改革的认识和思考

2007年的秋天,我很不情愿地做出了一个决定——把我的办公室重新粉刷一遍。这给我带来了许多不便。我不得不暂时回到家里工作,那是一幢位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建于19世纪的褐色石头建筑。我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把办公室里所有的东西都打包搬走。我的五十箱书籍和文件不得不被挪到了家里的一个房间放置,直到办公室的装修工作全部结束。

在刮腻子、做石膏层和刷漆等工作结束后,我开始一箱一箱地打开二十多年来积攒下来的书籍和文件,丢弃那些我不再需要的文件,把零散的文章装订成册。你可能会想,这些不起眼的东西与我从事的教育事业有什么关系呢?对我而言,收拾工作中用过的书籍、纸张的繁杂过程恰恰是一个令我愉悦的反思过程,因为这使得我回过头去思考这些年来我的教育观点的改变。

就在我把书籍和物品装箱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一场心灵危机,我意识到自己对教育的认识曾经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程。我曾经对考试、责任制、择校以及市场化所能带来的益处充满了希望甚至是热情,而现在我却发现自己对于这些改革深表疑虑。我试图分析出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我试图弄清楚为什么我越来越对这些改革——这些我一度狂热支持的改革——产生怀疑。我试图重新考量公众(也包括我自己)多年来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对教育的盲目信念。

我反复问自己,为什么对教育失去了信心。我的回答是:我有权改变自己的想法。这个理由就足够充分了。但是,我为什么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呢?是什么样的因素驱使我重新评价我曾支持了几十年的教育改革政策呢?我现在为什么会对我曾经支持的理论和政策



产生怀疑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就是因为我亲眼见证了这些改革政策在现实中所起的作用，因此我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本书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当有人斥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后来的思想与他自己之前所倡导的经济政策背道而驰时，他这样回答道：“当情况发生变化时，我的想法也会变化，你难道不会这样吗？”^①这样的回答也许不够有说服力，但我喜欢这个回答背后的思路。这表明一个有感知力的人应该从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能够认真地关注理论在实践中的可行性。

如果有人终其一生，从不承认错误，也全然不顾新的情况的出现，始终如一地顽固坚持同一种想法并对此深信不疑，那么，我们会怎么看这个人？怀疑和质疑是理性思维的重要标志。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意见过于执著，我们就很有可能忽视那些观点与我们相左的不同意见。怀疑的态度表明我们在思考，表明我们在碰到新事物、新情况时愿意重新审视那些我们曾经坚持的想法。

整理以前的文章，使得我有机会重温自己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不同时期所写的东西。当我一篇一篇地翻看这些文章时，我反复地问自己一个问题：与最开始时相比较，我的观点到底偏离了有多远？难道我这种在不同想法之间游荡的感觉，就像试穿一堆不合体的衣服一样吗？我慢慢地阅读、浏览这些文章，并回忆写文章时的情境，我开始发现，我四十多年来所写的东西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大主题。一方面我在不停地质疑人们对教学法的崇尚、追捧及与之相关的运动；另一方面就是我坚信内容丰富、连贯的学校课程大纲的重要价值，特别是经常被人们忽视的、让人不屑一顾的，或者被政治化了的历史和文学课程大纲的重要价值。^②

^① Alfred L. Malabre Jr., *Lost Prophets: An Insider's History of the Modern Economist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4), 220.

^② Diane Ravitch, "Tot Sociology: Or What Happened to History in the Grade Schools," *American Scholar* 56, no. 3 (Summer 1987): 343-354; Ravitch, "Bring Literature and History Back to Elementary Schools," in *The Schools We Deserve: Reflections on the Educational Crises of Our Tim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5), 75-79; Ravitch, *Left Back: A Century of Failed School Reform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多少年来,我一直反对那些倡导“学习捷径”的学者或组织,对他们宣称找到了轻松解决美国教育问题的方法表示怀疑。作为一名教育历史学家,我研究了很多号称可以使我们的学校和学生从痛苦的折磨中解脱出来的新潮理论。在1907年,威廉·坎德勒·贝格利(William Chandler Bagley)就曾批判过“在不同时期横扫教育界的各种风潮和改革”。几年之后威廉·亨利·马克斯韦尔(William Henry Maxwell),这位广受尊敬的纽约市教育主管官员,对教育理论家们向盲目崇拜他们的教师推销所谓的“灵丹妙药”的做法嗤之以鼻。例如“斜体书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又如课间休息是“未开化文明的象征”,等等。但同时也有一些人想取消学校的拼写和语法课,使学习变得不那么枯燥。^①我就曾在我的文章中提到过,受到公众热情追捧的、持续性的、席卷全国的教育改革风潮,不可避免地使我们偏离了改善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

在那个时代,政策制定者和商业界的领导者满怀热情地支持由市场经济的鼓吹者、在几个大的基金会的支持下所发起的教育改革运动。许多教育工作者虽然对当时的宣传标语持怀疑态度,但他们不得不遵从联邦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例如《“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

学校的改革者有时就像苏斯博士(Dr. Seuss)的童话《去太阳城真是好麻烦》(*Solla Sollew*)中的角色一样,总是在寻找那片“没有烦恼、麻烦少少的世外桃源”;或是像卡通片《小飞象》(*Dumbo*)中的小象,觉得只要插上了“神奇羽毛”就能飞上天!在我的文章中,我总是不断地提醒大家,在教育上既无捷径,也没有乌托邦可寻,更没有“魔法子弹”。那种能让大象一下子飞上天的“神奇羽毛”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我翻看泛黄的草稿本时,我开始慢慢理解我近些年的想法是如何发生改变的了,我也慢慢理解了,为什么我对当时流行的、有关择校和责任制方面的种种建议产生了持续增长的怀疑。我意识到我再一次开始对所谓的“灵丹妙药”持怀疑态度。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也

^① William Chandler Bagley, *Classroom Management: Its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 (New York: Macmillan, 1907), 3; William Henry Maxwell, “On a Certain Arrogance in Educational Theorists,” *Educational Review* 47 (February 1914): 165-182, esp. 165-167, 171.



在寻求灵丹妙药，我也沉醉于能够迅速解决棘手问题的“金丹”，我也跳上了一辆彩带装饰的花车庆祝教育考试，激励机制和市场的巨大力量。我也被所有这些新奇的点子迷惑住了。这些点子似乎能够结束教育界的官僚做法，使穷人家的孩子不被忽视，帮助那些经济贫困的父母，使穷人的孩子不会被淘汰，使得贫穷或富有的孩子、黑人或白人的孩子之间不再有学习成绩上的巨大鸿沟。考试会给那些不太好的学校的学生带来一道曙光，择校机制则会给穷人的孩子创造上好学校的机会。这些看起来似乎都是可行的，但仅仅是带一点经验主义味道的希望和憧憬。我愿意相信择校和责任制会带来好的成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数的事例告诉我，近些年的这些改革并没能最终实现那些美好的愿望，随着我的所见所闻越来越多，我也就越来越失去了信心。

看起来，还是有必要重新审视目前在美国教育中如此盛行的这些改革策略、重新评价其有效性。写这本书使得我有机会来谈谈我从学校改革中学到了什么，并且我希望本书以一种谦虚的态度，在承认本人认识上的局限性和不足的情况下，探讨如何使美国教育走上正确的轨道。

我写的第一篇关于美国教育的文章，在1968年被刊登在一本叫做《都市评论》(*Urban Review*)的小型教育期刊上。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课程大纲、安慰剂、万能药》，这篇文章标志着我从此开始全身心地关注在教育问题上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乌托邦的美好愿望与现实中棘手问题的冲突。我研究过那种短期的补习课程——那种专门为了帮助成绩不好的孩子而设计的短期干预项目，我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持续的优质教育才能改变一切”。我的第二篇文章是1969年发表的《基金会：在贫民区扮演上帝》(*Foundation: Playing God in the Ghetto*)。这篇文章探讨了当纽约市公立学校因分散化和社区集中控制的分歧而产生了长达数月的混乱时，“福特基金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① 这个问题(也就是让一个超级富有的既不需对任何人负责也不是被任何

^① Diane Ravitch, "Programs, Placebos, Panaceas," *Urban Review*, April 1968, 8-11; Ravitch, "Foundations: Playing God in the Ghetto," *Center Forum* 3 (May 15, 1969): 24-27.



人选举出来的基金会,来插手公立学校的改革是否合适)在本书中做出了我的回答。这个问题在当下尤显重要,因为有些全国性的大型基金会,按照公司运作模式来推进学校改革,而全然不考虑这样的模式对教育机构来说是否合适。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关于分散化还是集中化的争论趋向白热。报纸上设专版连载了关于社区团体要求学校社区分散化的故事,他们抱怨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在教育体系中缺乏对非主流文化背景孩子的重视,许多学校改革者认定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的家长以及他们所在社区的领导——而非专业的教育工作者——最了解他们的孩子需要什么。

就在人们大声疾呼要求学校管理分散化的时候,我开始好奇是什么造成了一开始的集中化制度。我花了一些时间,在纽约历史和社会学图书馆研究城市学校制度的历史。距现在最近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是在1905年。我发现自19世纪开始一直是分散化管理的制度。19世纪90年代的学校改革者要求学校管理集中化,来改善那些成绩不好的学校。他们强调学校只有由专业人士来管理才能提高成绩、学校管理层的腐败问题才能得以解决。我发现19世纪90年代的改革者要求集中化,与20世纪60年代的改革者要求分散化形成了惊人的对比。前期的改革者基本上是由社会精英组成,而后来要求分散化的则主要是家长以及社会活动家,他们想获得对学校的掌控。

由于感受到了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鲜明对比,我决定要写一本关于纽约城市公立学校历史的书,这也就是我后来写成的《纽约市的学校大战(1805—1973)》(*The Great School Wars: New York City, 1805—1973*)。^①这对于当时的我,一个毕业于休斯敦的公立学校,在历史或教育专业并没有很高学历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个挑战。在我完成这本书后,我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美国教育史的博士学位,这本书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在我攻读博士期间,我师从劳伦斯·克雷明(Lawrence Cremin),当时他是美国最大的教育历史学家。

^① Diane Ravitch, *The Great School Wars: New York City, 1805-1973*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克雷明劝我写一篇批判那些试图撼动公立学校根基的左翼历史学家的文章。他们称自己为“修正主义者”，因为他们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就是要推翻公立教育体系，要实现民主仁爱的神话。这些人都是各个大学的教授，他们讥讽地把公立学校认定为是精英压迫穷人的地方。这种观点与公立教育对我个人以及对整个国家而言的自由解放的形象背道而驰。我觉得自己有一种使命感要站出来驳斥它。

我后来写成的这本书叫《对修正主义的修正：对激烈攻击教育系统的批判》(*The Revisionists Revised: A Critique of the Radical Attack on the Schools*)。^①在这本书中，我捍卫了公立学校的民主性以及为大众服务的目的。我提出公立学校并不是由诡计多端的资本家发明的，用于把“社会控制”强加于并不情愿的无产阶级身上或制造社会不公平。学校也从不是激进分子所叫嚣的文化镇压的工具。相反，学校提供了一种最基本的机制，一个民主的社会通过这种机制使它的公民有机会读书、识字，进行社会交往。机会并不意味着必然成功，成功则取决于每个个体对机会的把握。学校并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社会问题，学校也并不完美。但是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学校无论是对于个体还是对于社会公益都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

我的另一本书，研究的是 1945 年到 1980 年间国家的教育政策历史。1945 年到 1980 年这段时间是历史上著名的几个重要的法院判例和联邦立法产生的时间。在《美国教育：艰难的十字军东征，1945—1980》(*The Troubled Crusade: American Education, 1945—1980*)这本书里，我分析了与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有关的很多有趣的纷争，例如教育革新、民权运动、双语教育、妇女运动，以及其他社会的政治的剧变。^②

在写《美国教育：艰难的十字军东征，1945—1980》这本书时，我越来越对学校课程的质量产生兴趣。我开始研究教学法、教学大纲和

^① Diane Ravitch, *The Revisionists Revised: A Critique of the Radical Attack on the School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② Diane Ravitch, *The Troubled Crusade: American Education, 1945-1980*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课程标准方面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文学和历史教学方面的发展历程，以及我们的文化在教学中的体现。在1987年，我与我的朋友切斯特·芬恩(Chester E. Finn Jr.)一起合作写了一本叫做《十七岁的孩子知道什么》(*What Do Our 17-Year-Olds Know*)的书。我们对孩子们在文化传统教育上的缺失感到痛惜，这本书触动了公众的神经，却遭到了当时崇尚后现代主义，并对传统“经典”反感的学术界的嘲笑。我们提出的观点是，如果你不了解传统“经典”，你就不能够去否定它。^①

在1985年，加利福尼亚州(简称加州)教育主管比尔·霍尼格(Bill Honig)邀请我帮助该州写一部新的历史教学大纲。在大概两年的时间里，我与一批教师和学者密切配合，起草了把历史与文学、地理、艺术、社会学和人文学相结合的历史教学大纲。这个大纲使得加州成为美国首个要求所有学生都要学习三年“世界历史”和三年“美国历史”的州，同时还对小学阶段的学生灌输大量的历史知识，并引入传记文学。这个大纲后来被州教育局所采纳并一直沿用至今，只在更新时做了一些微小的修改。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加州替换了它的阅读、数学和科学课的教学大纲，但是这部涉及美国和世界历史上一些最敏感和最有争议问题的历史教学大纲却一直延续了下来。^②

直到这时，我还没有太多考虑过关于择校、市场和责任制的问题。

然后，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1991年春天我接到了乔治·布什(George H. W. Bush)总统新任命的教育部部长拉玛·亚历山大(Lamar Alexander)的电话。亚历山大是一位温和的共和党人士，曾任田纳西州州长。部长邀我去华盛顿同他和他的副手大卫·凯恩斯(David Kearns)会晤。大卫·凯恩斯曾任施乐公司首席执行官。我们在白宫附近雅致的海·亚当斯酒店共进午餐。我们谈论了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问题(后来亚历山大部长开玩笑说是在讲他在

^① Diane Ravitch and Chester E. Finn Jr., *What Do Our 17-Year-Olds Know? A Report on the First National Assessment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7), 10-11.

^② *History-Social Science Framework for California Public Schools, Kindergarten Through Grade Twelve* (Sacramento: California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988); see also Diane Ravitch, "Where Have All the Classics Gone? You Won't Find Them in Primer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y 17, 1987; Ravitch, "Tot Sociology."

